

方言差异与语言转型趋势

——以普米语南北方言为例*

蒋颖

[提要] 本文通过普米语南北方言动词的人称、数、体、式以及助词差异的比较,揭示普米语的语言转型趋势,认为“北快南慢”的演变速度、“北简南繁”的规则系统,说明普米语正处于由屈折手段丰富转向分析性特点逐渐增多的发展过程之中。

[关键词] 普米语 方言差异 形态类型 类型转换

一 前言

语言演变的过程是缓慢的,在漫长的历时演变过程中,有的语言会出现类型特征的变化。如屈折语英语出现了分析性特征逐渐增加的演变趋势(Leech 1995;丁志斌、石红梅 2011)。对文献典籍比较丰富的语言,如英语、汉语等,可以通过书面材料的比较分析,梳理语言类型特点的变化。对缺乏史料典籍特别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则需要通过别的途径进行演变情况的研究。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同一语言不同方言之间的比较,都是进行语言演变研究的有效方法(罗仁地 2020)。

由于方言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往往能显现语言类型演变的趋势或层次。所以,从方言差异的比较研究中能够窥见语言转型的演变趋势。普米语在藏缅语中属于以屈折性特征为主、分析性特征为辅的语言,分南部和北部两大方言,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异较大,一般不能用母语直接交流。语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北部方言动词的形态变化存在简化、弱化现象,助词在使用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如果用语言转型的眼光来观察,就能看到它们受语言类型演变的制约,是语言类型演变趋势的反映。

语言或方言差异的解释有多种视角,但其中语言转型的视角是一个能够统摄全貌、看清本质、揭示成因、理清规律的视角。通过普米语南北方言的比较,大体能看到其由形态手段丰富转向增加使用分析性手段、分析性特点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符合藏缅语语言类型演变的整体方向,但也有普米语自身的特点。本文以动词、助词为例,对普米语南北方言的形态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和解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方言比较的普米语形态演变轨迹研究(19BYY189)”的阶段性成果。论文曾在“第5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成都 2021.10.29-31)上宣读。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普米语语料为笔者田野调查所得。普米语北部方言代表点为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瓦厂镇你依店村,发音人为次尔玛(女,1971年生,中专文化程度);南部方言代表点为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河西乡大羊村,发音人为和跃根(男,1955年生,小学文化程度)。

二 从动词语法范畴的形态差异看转型趋势

普米语动词有多种语法范畴，而且这些语法范畴大都使用形态变化的语法手段来表示。傅爱兰（1998:24）指出，普米语“动词的构形成分主要有3种：词缀、语音交替和重叠……构成的语法范畴有‘趋向’‘人称和数’‘量’‘体’‘式’‘态’”。其中，词缀手段主要包括趋向前缀与综合表达多种语法意义的动词后缀；语音交替主要指动词人称、数、体等的屈折变化，以元音交替为主，也有少量辅音或声调交替现象；重叠手段主要用来表示动词的量范畴、态范畴。由于普米语动词的语法范畴类型丰富，表现形式复杂，本文仅选择南北方言之间差异相对较大的人称、数、体以及式范畴中的命令式进行分析。

（一）从人称、数、体的差异看转型趋势

普米语南北方言动词都使用词缀、语音交替的语法手段来表示人称、数与体的语法意义。两种方言的动词都有人称范畴，体有已行体、进行体、将行体、即行体、完成体、曾行体等6种。人称、数与体的一致关系主要通过动词后缀的变化以及动词的内部屈折即语音交替的手段表现出来。通过比较南北方言陈述式动词的形态形式，其人称、数、体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

1. 两大方言使用有明显语音对应规律的动词后缀。如，已行体动词后缀北部方言第一人称称为 $soŋ^{55}$ ，第二、第三人称为 $sɿ^{55}$ ；南部方言第一人称单数为 san^{55} ，其他人称为 si^{55} 。

2. 两大方言已行体、完成体动词都会随主语人称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词根屈折，形成相应的语音交替形式。如，在已行体、完成体中，两大方言的第一人称动词都使用原形形式，第二、第三人称动词使用屈折后的变形形式。

两大方言动词在人称、数、体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与南部方言相比，北部方言的动词后缀系统简化了：在同一个“体”中，北部方言动词后缀的数量少。如，北部方言进行体动词后缀只有 $roŋ^{55}$ （第一人称）和 $rɿ^{55}$ （非第一人称）两个，而南部方言进行体动词后缀有 $zəuŋ^{55}$ （第一人称单数）， $zɿ^{55}$ （第二人称单数）， $zəu^{55}$ （第三人称）， $zən^{55}$ （或 zun^{55} ）（第一、第二人称复数）4个。又如，北部方言曾行体动词后缀只有一个 tu^{55} ，南部方言曾行体动词后缀有 $man^{55}sin^{31}$ （第二人称复数、第一人称）， $man^{55}siu^{31}$ （第二人称单数）和 $man^{55}su^{31}$ （第三人称）3个。

其二，与南部方言相比，北部方言动词的语音交替系统也简化了：在同一个“体”中，北部方言动词的语音交替形式数量少。以动词“给”为例，北部方言“给”有两种语音形式，原形为 $khin^{24}$ ，用于第一人称；语音交替形式为 $khun^{24}$ ，用于第二、第三人称。而南部方言“给”有三种语音形式，原形为 $khən^{24}$ ，用于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复数；语音交替形式有两种， $khəuŋ^{24}$ 用于第二人称单数， $khun^{24}$ 用于第三人称。

从上述异同分析中可以看到，普米语南北方言动词在后缀以及语音交替系统上存在“北简南繁”的特点，其规则系统可简要概括为如下两点：

其一，在人称与数方面，北部方言不区分单复数，人称也只分第一人称与非第一人称（即第二、第三人称）两类，动词按照人称的不同使用相应的后缀和语音交替形式；南部方言既区分单复数，又区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如，动词“摘”“嚼”“算”等在北部方言里有屈折变化，但只有第一人称与非第一人称两种屈折变化形式；在南部方言则要随体、人称、

数的变化而变化，变化形式多样，规则复杂。

普米语南北方言都有屈折变化的动词，以已行体为例。如表 1：

表 1 南北方言都有屈折变化的动词用例

例词	普米语方言	第一人称已行体		第二人称已行体		第三人称已行体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摘	南部方言	qha ²⁴	qha ²⁴	qhu ²⁴	qhun ²⁴	qhua ²⁴	qhua ²⁴
	北部方言	kha ²⁴		khua ²⁴			
嚼	南部方言	ti ⁵⁵	ti ⁵⁵	tiu ⁵⁵	tin ⁵⁵	tu ⁵⁵	tu ⁵⁵
	北部方言	ti ⁵⁵		ty ⁵⁵			
算	南部方言	tsɿ ²⁴	tsɿ ²⁴	tsiu ²⁴ /tsəu ²⁴	tsin ²⁴ /tsən ²⁴	tsu ²⁴	tsu ²⁴
	北部方言	tsi ⁵⁵		tsy ⁵⁵			

其二，在语音交替形式方面，北部方言主要出现在单元音韵母动词上，变化规则相对简单，不规则动词数量较少，一部分动词没有屈折变化；南部方言除了存在动词、不自主动词等少量没有屈折变化的动词之外，其他动词几乎都有词根内部的语音交替现象，变化规则比较复杂，而且还有数量较多的不规则动词。如，动词“割”“挑，扛”“穿（鞋）”等在北部方言里没有屈折变化，在南部方言要随体、人称、数的变化而变化。

普米语南部方言有屈折变化、北部方言无变化的动词，以已行体为例。如表 2：

表 2 南部方言有屈折变化、北部方言无变化的动词用例

例词	普米语方言	第一人称已行体		第二人称已行体		第三人称已行体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割	南部方言	ku ⁵⁵	ku ⁵⁵	kəu ⁵⁵	ku ⁵⁵	kui ⁵⁵	kui ⁵⁵
	北部方言	ki ⁵³					
挑（扛）	南部方言	tu ²⁴	tun ²⁴	tu ²⁴	tun ²⁴	tua ²⁴	tua ²⁴
	北部方言	tu ⁵⁵					
穿（鞋）	南部方言	tsy ²⁴	tsyn ²⁴	tsyu ²⁴	tsyn ²⁴	tsua ²⁴	tsua ²⁴
	北部方言	tcy ⁵⁵					

从南北方言动词的语音交替规则系统来看，南北方言都存在动词人称、数、体一致关系的形态变化，属于形态手段占优势的非分析型语言。但从方言规则系统的比较中，不难看到，北部方言的语音交替规则已简化了许多。这一结果说明，普米语两种方言的分析化程度并不一致，所处的语言发展阶段也不完全相同。其中，北部方言的演变速度较快，分析性相对较强；南部方言的演变速度较慢，分析性相对较弱。普米语南北方言动词人称、数、体的现状，正是历时演变趋势的共时展现。“北快南慢”的演变速度，“北简南繁”的规则系统，说明普米语已出现由屈折型语言向分析型语言发展的趋势，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现了语言类型演变的不同层次。这种转型也符合藏缅语族语言演变的共同方向——由非分析性向分析性方向发展。戴庆厦（2019）在讨论景颇语转型问题也曾提到：“原属于粘附型语法特点的景颇语，逐渐由粘附型向分析型转化，而作为景颇语词类之一的句尾词，由于它具有表示人称、数等

粘附成分，必然也会在粘附型和分析型特点的消长上发生变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普米语动词人称、数、体规则的发展变化也正是如此。

(二) 从命令式的差异看转型趋势

普米语南北方言都有式范畴，其中命令式按语气轻重可分为命令与祈求两类。

1. 语气的令式

语气命令式表示听话者被命令执行某动作，语气强硬。命令式的构成方式在南北方言中原本都是“主语（+趋向前缀）+动词命令式形式”，但北部方言由于有词形变化的动词数量减少了，仍保有词形变化的动词在变化规则上也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因此北部方言语气命令式多由“主语（+趋向前缀）+动词原形”形式构成。例如：

- (1) $nə^{31}rɿ^{55}sin^{31}boŋ^{55}xa^{31}tyu^{53}!$ 你们种树！（命令式）^①
 你们 树 (趋)种

上例中的动词 tyu^{53} “种”在北部方言中已无人称、数、体、式的词形变化，因此构成命令式时，与陈述式相比，区别仅在于句尾动词后缀的有无：命令式动词后不添加后缀。例如：

- (2) $nə^{31}rɿ^{55}sin^{31}boŋ^{55}xa^{31}tyu^{53}ŋ^{31}$.
 你们 树 (趋)种 (缀)
 你们种树了。（陈述式已行体）

北部方言部分动词还有“体”的形态变化，但没有“式”的形态变化，这样的动词构成命令式的形式也是“主语（+趋向前缀）+动词原形”。例如：

- (3) $nə^{24}le^{24}!$ 你唱！（命令式）
 你 唱

上例中的动词“唱”原形形式为 le^{24} ，第二人称已行体形式为 lue^{24} ，无“式”的变化形式，因此，这类动词也会构成“主语（+趋向前缀）+动词原形”命令式。

北部方言中有少量动词仍保留了“式”的形态变化，使用“主语（+趋向前缀）+动词命令式形式”构成命令式，但这类动词的数量不多。如例(4)中动词“吃”的原形形式为 dzi^{55} ，命令式形式为 dzu^{55} ：

- (4) $nə^{24}dzu^{55}!$ 你吃！（命令式）
 你 吃

南部方言命令式必须通过形态变化的手段来构成，形态手段主要有两种，在语言交际中可任选其一使用：

其一，通过动词自身的屈折变化，即由“主语（+趋向前缀）+动词命令式形式”构成命令式。动词命令式形式通常与同人称、数的动词已行体形式相同。例如：

- (5) $ni^{24}ʃɿhiŋ^{24}nə^{31}ji^{55}ti^{24}tə^{55}gu^{55}!$ 你再多穿一件衣服！（命令式）
 你 衣服 再 一(趋)穿

- (6) $ni^{24}ʃɿhiŋ^{24}nə^{31}ji^{55}ti^{24}tə^{55}gu^{55}si^{31}$.
 你 衣服 再 一(趋)穿(缀)
 你多穿了一件衣服。（陈述式已行体）

^① 本文例句标注中使用的缩略符号包括：“趋”表示趋向前缀，“缀”表示动词后缀，“连”表示连词，“施”表示施事助词，“与”表示与事助词，“自”表示自主助词。

例(5)、例(6)中动词“穿”的原形为 gu^{24} ，第二人称单数已行体形式为 gu^{24} ，命令式动词使用了与陈述式已行体完全相同的变化形式。与陈述式相比，二者的区别也仅在于句尾动词后缀的有无即命令式动词之后不添加后缀。

其二，通过动词后添加半分析半屈折的命令语气助词构成命令式即第二人称单数后加 $nə^{31}sti^{31}$ ，第二人称复数后加 $nə^{31}stin^{31}$ 。例如：

(7) $ni^{24}nəŋ^{31}təuŋ^{55}xa^{31}su^{31}nə^{55}sti^{31}!$

你 扣子 (趋) 扣 (二单命令)

你扣好扣子!

(8) $ni^{31}zɿ^{55}bzən^{24}xa^{31}stua^{55}nəuŋ^{55}khə^{31}stin^{24}nə^{55}stin^{31}!$

你们 绳子 (趋) 绕 (连) (趋) 放 (二复命令)

你们去把绳子绕起来放好!

南部方言构成命令式的两种形态手段，其中第二种是北部方言里完全没有的，第一种在北部方言里虽然还有，但数量较少。

综上所述，南部方言作为保留更多形态手段的方言，其命令式仍然遵守严格的形态变化规则——要么使用语音交替规则变化的动词，要么使用附加法，在动词之后添加半分析半屈折的命令语气助词。相比之下，北部方言命令式已经完全没有了附加手段，仅有少量动词保留屈折手段，不使用任何形态手段的命令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说明北部方言动词在式范畴上已明显存在语音交替形式磨损、脱落的现象，而这样的现象正是语言由屈折手段占优势向分析性手段占优势发展的渐变表现。

2. 祈求语气命令式

祈求语气命令式表示说话者祈求、希望听话者做某事，语气和缓。普米语南北方言祈求语气的命令式都有两个特点：其一，动词使用原形形式；其二，句尾附加祈求语气助词。其中，北部方言祈求语气助词只有一个 ku^{55} ，没有单复数的形式变化。例如：

(9) $nə^{24}/nə^{31}rɿ^{55}nə^{31}dzaŋ^{55}ku^{55}!$

你/你们 (趋) 坐 请

你/你们请坐!

南部方言祈求语气助词有单复数的形式变化：祈求第二人称单数做某事，在句尾加助词 qu^{55} ；祈求第二人称复数做某事，在句尾加助词 $quan^{55}$ 。例如：

(10) $ni^{24}də^{31}tʂhua^{55}nəuŋ^{55}ɛ^{31}tʂi^{55}syn^{55}nəuŋ^{55}dzu^{31}tʂie^{55}qu^{55}!$

你 (趋) 请 (连) 我 (与) 教 (连) 做 使 (助)

请你教我做吧!

(11) $nə^{31}zɿ^{55}də^{31}tʂhua^{55}nəuŋ^{55}ɛ^{31}tʂi^{55}syn^{55}nəuŋ^{55}dzu^{31}tʂie^{55}quan^{55}!$

你们 (趋) 请 (连) 我 (与) 教 (连) 做 使 (助)

请你们教我做吧!

从祈求语气助词差异的比较中也能看到，北部方言的分析性更为突出，南部方言的形态特征更为突出，即北部方言祈求命令式不区分主语的单复数，一律后加语气助词 ku^{55} ；南部方言祈求命令式则需要区分主语的单复数，单数为 qu^{55} ，复数为 $quan^{55}$ 。

在祈求语气助词上，北部方言没有形态变化，说明这一方言在式范畴的表达方式上也往分析型语言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蒋颖(2018)曾论述过助词对语言类型的意义，认为助词的

出现和发展，是分析性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分析性越强，助词越丰富，单个助词的多功能性越突出。普米语有的助词还具有表示人称、数等语法意义的功能，也就是说，普米语这些助词具有“两栖性”，虽然主要是分析性的，但还具有屈折的特点。

综合南北方言命令式比较的结果，我们认为普米语在命令式上的方言差异，实质上暗示了不同进度的语言分析化发展程度即南部方言已出现分析化发展的苗头，如，产生了较丰富的助词，包括命令语气助词与祈求语气助词，但分析化程度不如北部方言；北部方言向分析型语言转型的发展程度更深。从动词命令式来看，不仅动词多使用原形形式，丢失了命令式的语音交替规则，且命令语气助词也更接近分析型语言的助词特征，失去了形态变化的特征。

三 从助词的差异看转型趋势

普米语助词按其功用可分为句法结构助词、语义关系助词和语用助词3类，助词内部又各自下辖若干个小类，其中，一部分助词仍然“有人称、数、体等的屈折变化，与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蒋颖 2019:141）。下面以南北方言中差异较大的领属助词、施事助词与自主助词进行分析和比较，揭示普米语演变中出现的语言转型趋势。

（一）从领属助词的差异看转型趋势

普米语领属助词位于领属者与被领属者之间，用来标记领属与被领属的关系。北部方言领属助词为 $\gamma\alpha^{31}$ “的”，没有人称、数的形态变化，在句中可用可不用。例如：

$pa^{55}li^{55}$ ($\gamma\alpha^{31}$) $do^{31}khe^{55}$ 衣服的颜色 $ni^{31}t\check{c}ha\eta^{53}$ ($\gamma\alpha^{31}$) $phe^{31}te^{55}$ 小孩的帽子
衣服 (的) 颜色 小孩 (的) 帽子

当定语是人称代词等有领格形态变化的成分时，北部方言还可以使用双重限定的方式构成定中结构，即以“定语领格形式+领属助词 $\gamma\alpha^{31}$ ”的方式构成。例如：

(12) $a^{31}ra^{55}$ ($\gamma\alpha^{31}$) $pi^{24}z\check{q}^{31}z\check{a}^{55}tsha^{55}s\check{q}^{53}$.

我们的 的 笔用 完 (缀)

我们的笔用完了。

例(12)中人称代词“我们”的原形形式为 $a^{31}r\check{q}^{55}$ ，领格形式为 $a^{31}ra^{55}$ ，构成定中结构时，既可以使用“定语领格形式+中心语”格式，也可以使用“定语领格形式+领属助词 $\gamma\alpha^{31}$ +中心语”格式。领属助词 $\gamma\alpha^{31}$ 在定中结构中不具备强制使用的句法地位，属可用可不用的句法成分。

普米语南部方言领属助词有数的形态变化，单数限定语之后为 ga^{55} “的”，复数限定语之后为 $z\check{a}^{55}$ “的”。单数领属助词 ga^{55} “的”通常可用可不用，复数领属助词 $z\check{a}^{55}$ “的”因为具有别义功能在句中必须使用，具有句法上的强制性。例如：

(13) $a^{55}f\check{h}in^{55}a^{55}mei^{55}$ (ga^{31}) $mu^{24}d\check{o}^{31}$.

阿庆 阿妹 (的) 弟弟 是

阿庆是阿妹的弟弟。

(14) $gu^{55}ma\eta^{31}z\check{a}^{55}dz\check{q}^{31}dz\check{q}^{24}s\check{q}^{31}z\check{a}^{24}to^{55}kh\check{o}^{31}f\check{t}\check{q}i^{24}$.

老师 的 书 桌子 上 (趋) 放

把老师们的书放到桌上。

从上述比较可见，南北方言领属助词有两大差异，一是北部方言领属助词没有数的形态

变化,南部方言有。二是北部方言领属助词不具有句法上的强制性,在句中可用可不用,而南部方言复数形式的领属助词具有句法上的强制性,在句中必须使用。说明普米语正处于向分析型语言转型的演变过程之中。

形态差异说明普米语已出现转型趋势。南部方言领属助词属于“半屈折半分析”型的助词,源自人称代词领格的形态变化,仍具有屈折性质。如, $tə^{55}gu^{55}$ “他”、 $tə^{55}zɿ^{55}$ “他们”的领属格形式分别是 $tə^{31}ga^{24}$ “他的”与 $tə^{31}za^{24}$ “他们的”,通过元音交替的形态手段来表示代词的格变化。南部方言领属助词正来自这一形态手段,取第三人称单数领格后一音节为单数领属助词,取复数领格后一音节为复数领属助词。领属助词脱离形态手段发展成为助词,这本身就是语言由屈折语向分析语发展的关键一步,有此基础才能逐渐向分析型结构助词“的”演变。但与强分析型语言如汉语相比,普米语南部方言的“的”仍带有一定的屈折特征,还要随领属者“数”的变化产生相应的形态变化。与之相比,北部方言领属助词又往分析语方向迈进了一步:不仅产生了领属助词“的”,而且“的”不再有任何形态变化,无论领属者是单数还是复数,“的”都只有一个词形 ya^{31} ,这样的助词显然分析性程度更高。

句法强制性的差异也能说明普米语已出现转型趋势。南部方言复数形式的领属助词具有句法上的强制性,其强制性来自复数领属助词的别义作用而非句法作用。因为“老师们的书”显然与“老师的书”语义有别, za^{24} “的”使用上的强制性来源于“复数”义的强制性,“的”义只是 za^{24} 的附加义而非基本义,“的”的功能也只是 za^{24} 后起的附加功能而非基本功能。其附加功能凭借语义上的强制性,为领属助词的产生提供了“句法空格”——领属成分与被领属成分之间的“的”由此语义层面上升至句法层面。由南部方言领属助词的现状也可反推其形成的机制是:原本没有领属助词的普米语借助人称代词单数形式产生了单数领属助词 ga^{55} ,借助复数形式产生了复数领属助词 za^{55} ,在原本“数”的语法意义上进一步添加了“表领属”这样的结构义,“数”义与“结构”义一起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立的助词小类——领属助词。脱胎于屈折变化的领属助词能够产生,说明普米语有屈折向分析发展的趋势。

与南部方言不同,北部方言领属助词 ya^{31} 一般不具有句法上的强制性,它没有“数”的形态变化,不具有数的别义性,在句中通常可用可不用。这一南北差异正说明北部方言领属助词 ya^{31} 在分析化的发展道路上比南部方言走得更快。北部方言 ya^{31} “的”在句子中只起语法作用,辅助表示较虚的“结构”义,没有实在的“数”义,也没有别义作用。正如杨延宁(2019:45)所说,“语言演变是在形式与意义的互动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毫无句义贡献度的成分能够出现在北部方言里,说明北部方言具有了容纳不表实义的领属助词的机制,从整个语言系统的角度开始接受分析性成分的融入。

比较南北方言的领属助词,我们认为普米语的南北方言都在往分析化方向发展,但二者的发展速度不同。南部方言分析化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由形态分化逐渐获得 ga^{55} “的”与 za^{55} “的”这样的成分,并通过别义功能进而为产生独立的领属助词提供了句法空格,助词演化的过程比较缓慢,至今仍处于半屈折半分析阶段,尚未实现彻底的分析化;北部方言分析化发展的速度相对较快,领属助词 ya^{31} “的”没有实义,没有形态变化,只有句法功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分析性很强的结构助词。

Weinreich 等(1989)认为,语言的“演变在语言结构中的铺开既不是划一的,也不是瞬时的,它包含互相联系的几个变化在一个实际时段内的共变,并表现为同言线在地域空间上的扩散”。虽然普米语南北方言领属助词的发展速度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都不太一样,但其中

所反映出来的普米语向分析语转型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 从施事助词的差异看转型

施事助词位于名词性成分之后，标记该成分是动作的发出者，通常起强调施事者的作用。普米语北部方言施事助词为 $n\epsilon^{55}$ ，没有形态变化。例如：

(15) $gi^{31}gin^{55}rj^{55}n\epsilon^{31}t\sin^{55}won^{31}\zeta\alpha^{31}\zetaue^{31}tsha^{55}pa^{55}s\eta^{31}$.

老师 们(施)房子里 扫地 完 (自)(缀)

老师们把房间扫完了。

南部方言施事助词有形态变化，需要随施事者人称、数的变化而采用相应的词形。单数施事助词通常为 $gue^{31}je^{31}$ 或 gue^{31} 、 je^{31} ，复数施事助词通常为 $ze^{24}je^{31}$ 或 ze^{55} 。例如：

(16) $gur^{55}maj^{24}ze^{55}je^{31}t\sin^{55}wu^{55}\zeta\alpha^{31}\zetaue^{55}thouj^{55}pa^{55}si^{31}$.

老师 们(施)房间里 扫地 完 (自)(缀)

老师们把房间扫完了。

南北方言施事助词的最大差异是有无形态变化。北部方言只有一个施事助词 $n\epsilon^{55}$ ，且没有任何形态变化，既不随施事者的人称而变化，也不随施事者的单复数而变化，施事助词表现出了较强的分析性特征。但在屈折性较强的南部方言中，施事助词仍有形态变化，具体词形要与施事者的人称、数保持一致。这说明南部方言施事助词的独立性偏弱，仍具有较强的屈折特征。从普米语两大方言施事助词的差异来看，北部方言的分析化程度仍超过了南部方言。

(三) 从自主助词的差异看转型趋势

普米语南北方言里都有自主助词。“普米语动词有自主和不自主的对立。自主动词在语义上通常是施动者能够自己做主发出、支配、控制的动作行为；不自主动词反之。……自主助词主要是加在不自主动词后，使本来没有自主性的动词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从而能够取得与自主动词同等的句法地位”（蒋颖 2012）。北部方言自主助词在陈述式已行体、完成体以及命令式中有形态变化，在陈述式里，第一人称主语时为 pu^{55} ，非第一人称主语时为 pa^{55} ；在命令式里为 pu^{55} 。例如：

(17) $be^{55}a^{55}n\epsilon^{55}khu^{31}d\eta^{55}tsha^{55}pu^{55}sonj^{53}$.

饭我(施)(趋)吃完 (自)(缀)

饭我吃完了。

南部方言自主助词在陈述式已行体、完成体以及命令式中也有形态变化，与北部方言比较，南部的形态变化要复杂得多。南部方言自主助词的原形形式为 pu^{55} ，用于陈述式进行体、将行体、即行体和曾行体里。在已行体和完成体里，自主助词要随主语人称、数的变化而变化，有 pu^{55} （第一人称单复数）、 pin^{55} （第一人称单复数或第二人称复数）、 pu^{55} （第二人称单数）、 pa^{55} （第三人称单复数）4 种形式。在命令式里，自主助词的变化规则与第二人称已行体形式相同，即第二人称单数为 pu^{55} ，第二人称复数为 pin^{55} 。例如：

(18) $d\eta^{55}t\alpha^{55}gur^{55}d\eta^{55}thouj^{55}pa^{55}si^{31}$.

饭他 吃完 (自)(缀)

饭他吃完了。

从南北方言的用例可清楚地看到：南部方言自主助词的形态变化比较复杂，屈折性特征显著，分析性不强；北部方言自主助词的形态变化相对简单，分析性比南部方言强。科姆里（1989:54）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也许全部）语言并不确切地相当于这些类型中的某一种

类型，而是在综合指标和融合指标上都介于两个极端之间，因此形态类型研究给我们提供的不是离散类型而是连续类型，也就是说，给定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给这种语言在由综合指标和融合指标各自限定的连续体上分配一个位置。”通过对普米语南北方言自主助词的观察，我们也可总结出：普米语的形态特征由南向北正处于日趋简化、弱化的过程之中。

四 结 语

本文通过普米语南北方言的比较，尝试从方言间的共性和个性中发现语言转型趋势的迹象。普米语南北方言在语法手段、语法范畴、词类等多个方面演变上的不平衡性，反映了语言类型演变的层次性。同时，方言比较将历时演变的纵贯线展现在方言差异的横剖面上，使原本隐性的演变趋势表现为显性的变化轨迹。总结如下：

1. 从动词、助词的比较来看，普米语南北方言总的演变趋势是形态逐渐衰退，分析性逐渐增强，语言有屈折语向分析语方向发展和转化的趋势。

2. 在向分析化方向发展的总趋势下，也存在局部的不一致现象。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演变速度不一致。北部方言的分析性更强，演变速度较快，南部方言的分析性更弱，演变速度较慢。二是局部特征不一致。就某一具体语言现象的演变而言，两种方言的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有时甚至还会出现跟该方言总体趋势不一致的局部特征，即出现“反例”现象。三是分布规律不一致。普米语语言转型的发展阶段与藏缅语地理分布的常见规则不一致。普米语南部方言的分析性更弱，北部方言的分析性更强，这与藏缅语北部语群形态多，南部语群形态少的常见地理分布规律不一致。

3. 藏缅语绝大多数语言缺乏历史文献，无法直接探求其形态演变轨迹，所以，从亲属语言或同一语言不同方言的比较中寻求历时演变的线索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此外，从同一方言母语使用者的代际差异中也能观察到语言发展演变的趋势。普米语南北方言中都存在形态手段老年人掌握得更好、青少年掌握得较差的现象，而且代际差异的情况在南北方言中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参考文献

- [1] 伯纳德·科姆里. 1989.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沈家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2] 戴庆厦. 2019. 《语言转型与词类变化：以景颇语句尾词衰变趋势为例》，《民族语文》第1期。
- [3] 丁志斌、石红梅. 2011. 《英语语法化演变的类型学特征》，《外语教学》第2期。
- [4] 傅爱兰. 1998. 《普米语动词的语法范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5] 蒋颖. 2012. 《普米语自主助词及其语法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
- [6] 蒋颖. 2018. 《论普米语的类型定位》，《民族语文》第3期。
- [7] 蒋颖. 2019. 《云南兰坪普米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 [8] 罗仁地. 2020. 《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语言接触学》，《汉藏语学报》（第12期）第1-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9] 杨延宁. 2019. 《语言演变研究的系统功能模式——以古英语使役构式和古汉语动结构式分析为例》，《中国外语》第1期。
- [10] Leech, Geoffrey N.. 1995. 《英语语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蓝纯译，《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 [11] Weinreich, Uriel, William Labov & Maivin I. Herzog. 1989.《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下), 王洪君译述, 《国外语言学》第1期.

Dialectal Differences and the Trend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ialects of the Pumi Language

JIANG Ying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person, number, aspect, mood and particle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dialect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trend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in the Pumi language. It maintains that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dialects differ in the speed of evolution, i.e., a faster evolution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versus a slower evolution of the Southern dialect, and in the system of grammatical rules, that is, a simpler system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versus a more complex system of the Southern dialect, which shows that the Pumi language i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from a language with rich inflectional devices toward a language with increasing analytic features.

[Keywords] Pumi language dialectal difference morphological type 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

《戴庆厦先生口述史》出版

戴庆厦口述、赵燕珍采访整理的《戴庆厦先生口述史》于2022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既是对70年来戴庆厦先生在语言学领域勤奋耕耘和创新贡献的真实记录,也是对新中国民族语言研究光辉历程的深情回顾。与语言学研究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学习、科学研究、语言大调查、景颇语研究、“田野调查派”、濒危语言调查研究、语言国情调查研究、跨境语言调查研究、语言和谐调查研究、反观论等。

戴庆厦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主要从事汉藏语系语言、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该书记述了戴庆厦先生70间的主要学术经历和社会经历,可以看作是戴庆厦先生的个人成长史、学术史、奋斗史和精神史的写照,对激励有志青年学者辛勤耕耘、砥砺奋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刊编辑部